

# 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父职情感规则探赜\*

王 亮

**内容提要** 鉴于外向的情感表达不符合传统父职的文化规范,鲜少有研究关注父职的情感议题。本文关注城市家庭中的父亲如何在儿童照护中与孩子维系亲密的情感互动。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父职的情感规则发生了转变,即从一种强调父亲权威、身体缺席、保持情感距离、情感表达保守的模式迈向一种注重沟通与交流、具身亲密体验、情感表达积极的模式。这不仅是个体的情感反思的能动性结果,也是顺应现代家庭人口结构、情感结构变化与情感功能回归的必然趋势,还是男性对情感文化变迁以及国家对家庭建设的回应。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情感面向,为理论化亲子间的情感实践和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亲密父职 情感规则 城市家庭 生育友好型社会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60428.003

##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生育率低迷的现实背景下,育幼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除需优化育儿责任分担、假期时长安排与福利津贴补偿等支持外,亦应着力于情感维度的关怀,促进儿童情感社会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型,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之中,也嵌入家庭制度与性别秩序的重塑过程。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提高、性别平等理念的推进以及生育支持体系的渐次完善,男性的传统家庭角色正在经历转变。提起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大多数聚焦城市家庭的研究发现,尽管父亲的参与水平低于母亲,但他们参与育儿比较普遍,不仅为子女提供常规照料,还承担起对子女教育、陪子女娱乐等责任。甚至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为了保证自己和妻子都有机会“为自己而活”,男性也会支持妻子的职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不同世代个体的人生模式及其现代化转向研究”(项目号:23BSH001)的阶段性成果。

业发展,选择深度参与育儿。<sup>①</sup>因此,有学者提出“关爱父职”,指出当代中国父职正在由“缺席父亲”迈向“关爱父亲”的起步阶段。<sup>②</sup>不仅中国,西欧和北美的研究也普遍揭示了男性正在突破养家糊口的传统角色,积极参与儿童照护,成为兼具经济支持与身心照护的“新父亲”。<sup>③</sup>

遗憾的是,父亲参与的情感维度未得到充分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父职文化框架的限制,文化框架不仅命名和定义了情感,还限定了情感的强度,明确了情感所依附的规范和价值取向。在大多数社会的文化氛围里,情感(尤其积极的情感展示)与传统的男性气质背道而驰。男子汉气概的性别期望也与“好父亲”的期望之间存在矛盾。“像个男人样”和“做个真男人”这样的日常表述暗示着男性应该控制、隐忍情绪和感受。特别是在儒家文化盛行的东亚社会,传统上,父子之间的亲昵互动并不被鼓励和支持。这种对父职情感的漠视也恰好反映了被结构化的性别文化。与传统理念不相符的是,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亲密的父子互动在中国城市家庭较为普遍。基于此,本文以情感规则为分析棱镜,关注当代城市父亲如何在儿童照护中与孩子维系亲密的情感互动,以期窥探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情感世界。

### 文献脉络与资料来源

#### (一)父职研究的情感转向

在西方文明的脉络中,父亲被视为权力的象征、经济的持有者与教育的掌权者。例如,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中的众神共同塑造了崇高的父亲意象。罗马充分吸收了希腊的文化,使得父亲对孩子的权威达到顶峰,不仅从法律上定义了父亲的权利,也通过“举高”的仪式赋予了父亲神圣性的色彩,父亲成为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高大、强壮和坚定的形象。<sup>④</sup>在中国,儒家父职作为中国父职之本,自产生之时起,便从道德指引、榜样模范及教育职责方面规定与限定了为父之道。在传统的父权观念下,男性家长被赋予不容置疑的权威。为了维持家庭秩序,父亲不仅要与子女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还要通过言语和行为上的严厉来展现权威和责任。总体上,家庭中联结亲子关系的情感是“敬”而非“亲”。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不少心理学者、女性主义运动者号召并推动“新父亲”倡议,呼吁男性重视家庭,父亲与孩子的互动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末,随着亲密关系的变革,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和情感交流基础之上的“纯粹关系”正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浮现,亲子关系开始趋向平等和民主。<sup>⑤</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一些学者基于“性别实践”(doing/undoing/redoing gender)理论,将育儿理解为协商与再生产男性气质的关键领域,揭示父亲如何在照料实践中重塑男性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亦有研究将父职置于性别文化理念、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福利制度安排等相

① 范譔:《城市家庭中的父亲深度育儿参与——兼论男性个体化家庭责任意识》,《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② 王向贤、郝晓宇:《抖音上的关爱父职:常人榜样与引流变现》,《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③ 王亮:《“新父职”研究:概念厘清、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

④ L. Zoja,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57-158.

⑤ A. Gidde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88.

互交织的情境中考察,强调父职转型所嵌入的社会结构背景。近年来,不少研究关注儿童照护中父子之间的情感互动,相关父职叙事也逐渐突破“身体在场/缺席”的二元对立,并迎来了父职研究的情感转向。在这些讨论中,英国社会学家德摩特(E. Dermott)提出“亲密父职”这一概念,强调对英国中产白人家庭而言,男性在儿童照护中投入的情感及其情感表达是实现“成功父职”的必要条件。<sup>①</sup>较为遗憾的是,德摩特对亲密父职的论证较为薄弱,也未指出促使亲密父职形成的结构性力量。对此,有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契合东亚儒家社会严慈相济、经济与情感交融的父职实践特征。<sup>②</sup>最近,关于跨国父职的研究,有力揭示了性别、经济、情感与移民身份等多重因素如何交织并共同塑造父亲身份。例如,在墨西哥农村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许多父亲被迫前往美国务工。这些父亲既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也常常陷入自责,担心自己的缺席对孩子情感社会化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sup>③</sup>

中国父职的情感议题近年来逐渐进入研究视野。一些学者关注“数字奶爸”等“线上父亲”在平台亲子关系中的情感劳动展演,揭示父亲情感劳动的异化和主体性的呈现。<sup>④</sup>另有关于“周末爸爸”的研究发现,“流动”成为父职转变的契机,身处流动之中的父亲更加注重增强情感表达来关爱孩子。<sup>⑤</sup>因此,彰显温情、注重表达的中国父职实践风格正逐步显现。

总体上,既有研究虽揭示了男性在儿童照护中情感表达的可塑性,但这些讨论存在以下张力。其一,微观与宏观的张力。既往研究或聚焦个体育儿行为,如身体照护、情感支持等,或讨论宏观政策的影响,如家庭友好政策的积极作用,却未揭示宏观结构性变迁与微观个体实践间的联动。其二,情感与权力的张力。传统儒家父职强调“敬”而非“亲”,但现有研究未解释当代父亲如何在权威与亲密之间协商情感边界。其三,线上与线下的张力。既往关于中国父职情感议题的讨论主要聚焦“线上父职”,线下生活中父子的情感互动有待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引入“情感规则”这一概念,探索中国城市家庭父子关系中的亲密实践。情感规则由美国情感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 R. Hochschild)提出,在她看来,社会的情感文化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能够指导人们在不同情境中如何感受或体验的情感意识,包括以适当的态度、感受和行为来应对特定的社会情境。而这一套规范个体在情境中如何感受、体验和表达的原则就是情感规则。<sup>⑥</sup>换言之,情感规则是社会或文化对特定情境下情感表达的规范性要求。虽然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并不直接与父职相关,但她鲜明地指出,任何类似亲子关系这样的亲密关系,都受制于各种文化规范。这些文化规范预先限定了哪些感受的表达是可以被接受的,我

<sup>①</sup> E. Dermott, *Intimate Fatherhood: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110-130.

<sup>②</sup> L. Wang, R. Keizer, “Drivers of Intimate Fatherhood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ldhood Experiences, Social Media, and Partner Encouragement”, *JFR—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Vol. 36(2024), pp. 211-228.

<sup>③</sup> A. E. Lee, M. A. Macías-Ayala, “‘To Separate Myself from Them, I Think I Will Feel Great Sadness’: Transnational Fatherhood and Border Regimes in Central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60, No. 1(2025), pp. 98-114.

<sup>④</sup> 王蕾:《后传统时代的“新父亲”——数字奶爸的线上情感劳动与父职媒介形象重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2期。

<sup>⑤</sup> 高修娟、曾令峰:《流动视角下城市“周末爸爸”的父职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

<sup>⑥</sup> A. R. Hochschild,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5, No. 3(1979), pp. 551-575.

们“应该”或“不应该”这么感受,“有权利”或“没权利”那么感受。<sup>①</sup>

鉴于此,本文将父职情感规则界定为:为父实践中所遵循的、关于应当感受何种情感、如何表达与管理情感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既是文化话语对父职的情感期待,也通过日常实践内化为父亲的情感表达模式与互动方式。作为一个被建构的范畴,不同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脉络所赋予的情感规则是不一致的,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呈现新的特征。<sup>②</sup>在此意义上,情感规则为理解父职提供了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探讨父亲与孩子之间如何形成情感互动,即情感规则的生成;其二,分析社会结构性变迁与文化变化等对父职情感规则的形塑。

## (二)分析资料说明

本文的分析资料来自两个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通过面对面的访谈、线上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来收集资料。在2021年2月至2026年1月期间,笔者访谈了40个城市家庭的父母,其中包括40位父亲,15位母亲,并对其中的5个家庭进行了参与观察。在这40个家庭中,面对面的受访父亲有28位,另有12位父亲通过线上腾讯会议或微信视频受访。出于学术伦理的考虑,本文所涉及的人名,皆作了匿名化处理。关于受访者的社会学基本特征,部分受访者的信息如表1所示。<sup>③</sup>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关注父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所以呈现的访谈资料以和谐、亲近、亲昵等表示父子之间“亲”的叙述为主。

表1 部分受访父亲的基本情况

编号	昵称	年龄	学历	职业	孩子性别(年龄)	所在地
1	健健爸	31	本科	药店柜员	男(3)	贵州
2	阿星	31	本科	事业单位员工	女(2)	
3	小宇爸	33	本科	公务员	女(7),男(2)	
4	妍妍爸	29	本科	房地产经理	女(2)	重庆
5	林俊	32	本科	房地产经理	男(2)	
6	小韩	32	硕士研究生	中学老师	女(5)	河北
7	老于	36	大专	民企中层	女(2)	
8	小象爸	33	博士研究生在读	科研工作者	男(2)	四川
9	阿明	34	本科	国企高管	男(2)	福建
10	玲玲爸	37	大专	工程师	女(6)	山东
11	希希爸	29	大专	私企职员	2男(6,1)	江西

## 具身性、沟通性与表达性:中国父职的情感规则

结合受访者的叙述,本文将父职情感规则概括为三个维度:具身性、沟通性与表达性。具身性强调大多数父亲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照料实践,这些互动加深了他们对孩子生活习性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培养父子之间的感情。另外,具身性还表现在许多父亲通过与孩子身体贴近、

<sup>①</sup>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98页。

<sup>②</sup> 王亮:《情感劳动研究的文化转向》,《浙江学刊》2022年第4期。

<sup>③</sup> 考虑到篇幅的限制与资料的同质性,笔者仅将本文提及的受访者信息在此列出,表格中的年龄均为访谈时的年龄。

肢体接触的方式来增进与孩子的亲近感,建立情感联结。沟通性强调父亲对与子女交流的重视。许多父亲表达了想要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内心世界的渴望,倾向构建更为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表达性强调父亲情感的外显化,即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中不再抑制或隐藏情感,而是积极表达鼓励、亲昵、喜爱、喜悦等情绪或通过展演情感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

#### (一)从身体缺席到具身互动

在受访者的回忆中,父亲在童年时的身体缺席构成普遍的集体叙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儿童照护责任也由国家逐步转向家庭,这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养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受访者回忆起父亲时,都将其描述为养家糊口的贡献者和身体照料的缺席者。然而,在当前的亲子关系中,一些父亲尝试通过亲身参与照料工作(如给孩子洗澡、按摩、喂食等)以及寻求身体贴近(如抱抱、亲亲、哄睡孩子等)等方式来提升与孩子的亲密感,并且他们在这些互动中获得了积极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在孩子3岁之前,大多数父亲在祖辈和育儿嫂的帮助下,学习照料技能,参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照料活动。他们把参与日常照料的过程视为一个了解孩子、亲近孩子,并与孩子培养感情的过程。

来自贵州的阿星与从事教育行业的妻子育有一个2岁的女儿。2022年4月,阿星向单位申请10天的育儿假在家照顾女儿。那段时间,作者曾目睹阿星的如下日常:给女儿洗澡、换尿不湿、更换衣物以及在为女儿备食、喂食过程中轻声哄女儿、为女儿护肤等。长期的具身照料增进了阿星和女儿之间的亲密感。父女俩在外人面前总能展现出很“亲”的画面。例如,当阿星口中说出“I love you”时,女儿也会迅速地回他一句“I love you”。父女之间也会展开频繁对话。例如,阿星会问女儿,“爱不爱爸爸?”“想不想爸爸?”“家里,你最爱谁?”“爸爸爱不爱你?”……;而女儿会回答,“爱爸爸,爱爸爸”“要和爸爸一起出去”“想爸爸”……。

比起承担照料工作,父亲倾向于寻求身体贴近来向孩子表达父爱,以展现和孩子很“亲”。例如,“亲亲孩子的额头、脸颊”“下班回家后拥抱孩子”“出门游玩时牵着孩子的手”“抱着孩子看电视”“把孩子抱在自己的腿上”“陪孩子一起睡觉”等在访谈和参与观察中很常见。来自河北的老于目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层管理者,访谈中,他多次向作者描述了与2岁女儿很“亲”的场景。比如,他会“抱抱她(指女儿),亲亲她,摸摸她”。在老于看来,“肌肤上的亲密,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也是能让她感受到的最直观的方式”。(20230506)此外,在访谈中,老于常用“抱抱”“搂着”“摸着”“碰碰”等动词描述与女儿的亲密互动。在与孩子妈妈的访谈中,她还提到,平时老于也会通过一些角色扮演(如扮演小老虎、做鬼脸)和游戏(捉迷藏)来哄女儿开心、逗女儿笑。(20230507)其他受访者也会用“黏人”来描述与孩子的亲密。

#### (二)从权威式疏离到沟通式亲密

儒家父职强调父亲对孩子的绝对权威。传统上,父亲不应该也无须轻易涉足女眷或孩子的生活圈。<sup>①</sup>然而,如今的父亲们高度重视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这成为当代城市家庭父职的一项新伦理。这些沟通和交流承载着父亲对了解孩子想法、需求和内心世界的渴望。

根据受访父亲的回忆,在孩童时期,他们的父亲扮演着权威角色,对父亲的情感是“敬”而

<sup>①</sup> 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非“亲”。因此,他们与父亲的沟通、交流也很少,更谈不上平等的父子关系。但在当前的父子关系中,他们渴望并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希望通过这些互动来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内心世界。例如,贵州的健健爸如此描述他和3岁儿子的互动:“在充当父亲的同时,我也会带着朋友的情感。如果以严父的心态教育娃娃,和娃娃是沟通不了的。”(20210219)

显然,与强调严格等级秩序的严父要求相比,当下的父亲更强调民主、平等的沟通对话。传统“父父子子”的关系模式如今逐渐被削弱,父子关系变得扁平化。除了强调“沟通”“交流”之外,“谈心”“倾听”“心里话”等也是很多受访者谈及亲子互动时普遍提到的关键词。另外,相互的对话也可展现父子之间的“亲”。在交流的过程中,父亲会主动向孩子诉说自己的想法,甚至表现出对孩子喜欢事物的浓厚兴趣,以及通过夸赞孩子来增强亲子互动,进而加深父子间的情感交流。例如,河北的小韩在陪女儿看动画片时,尽管自己知道动画片的人物角色,但他还是会以幼稚的心态来模仿孩子的语气询问细节。比如,小韩的妻子说道:“他会问,这公主是谁呀?他会说,好好看呐!然后说,裙子你喜不喜欢呢?然后问,她手上戴的是啥呀?其实他都知道,只是想让孩子告诉他。”(20230516)

在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很多父亲在给孩子讲故事时,常常会模仿孩子的语气,用生动的语调来讲述绘本内容,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这种亲子互动不只是简单的故事传递,更是父亲与孩子之间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建构的一种体现。这些分享揭示了当代父亲不仅欣然接受亲近、关爱的父亲形象,也愿意与孩子建立更加平等、亲密的关系。

但是,沟通式亲密并不意味着亲子关系的绝对平等。一些父亲会进行情感边界协商,根据情境、时间、孩子的行为表现等因素,灵活调整互动策略,并不在“慈”与“严”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认为,在孩子的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等教养方面,“管”和“教”依然很重要。例如,来自江西的希希爸提及了教育孩子时的冲突:“他总觉得我教育得不对。我说要是别人的话,我都不会教育他,就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我要把你教好,要管你,对你负责。说这些话他可能会听不懂,就觉得我对他太严。”(20230502)因此,父亲的权威和沟通式亲密并非相互排斥,而可以相互融合,并呈现在一位父亲身上。这揭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父亲角色的混合特质,既保留了受儒家父职影响的一面,也展现出当代父亲细腻温情的一面。

### (三)从沉默的父爱到言说的亲密

父权社会向男性传授了一种情感坚韧主义的理念,要求男性学会隐忍、抑制情感表达。但是,如今的城市父亲正在建构一种慈父形象,他们热衷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情感方式来维持亲子之间的亲密感。首先,与传统“沉默的父爱”不同,很多父亲认为,父爱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因此,他们通过直接的口头表达和鼓励性话语来展现父爱;其次,一些父亲通过情感劳动策略来迎合孩子的需求,为孩子的成长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

言语表达是很多父亲向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诸如“爸爸爱你哦”“爸爸是爱你的”“爸爸非常喜欢你”“爸爸多想你啊”等这些叙述在访谈中很常见。有些父亲也会用亲昵的称呼,如“宝宝”“小公主”,或以诸如“乐乐”“溜溜”等叠音词作为孩子的小名,以展示和孩子的亲近感。另外,口头表达还表现在与孩子对话过程中父亲用词的讲究。比如,福建的阿明在分享同2岁儿子溜溜的交流过程时,说道:“我会问(孩子):你爱不爱爸爸?爸爸很爱很爱你。也会和他说话,爸爸要去上班啦,爸爸要去赚钱啦,赚钱给溜溜买玩具呐。”(20220516)

阿明是一位非常注重培养儿子男子汉气概的父亲。他认为,身为父亲的首要责任就是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要把溜溜培养成很“刚”的男孩。访谈中,他也很少使用情绪化的词汇,尽量呈现一种理性、冷静、果断的立场。然而,在分享与孩子交流互动的情境时,他语速变得很慢,语调也变得很温和。同时,在讲述中,他会使用一些语气词来拉近与孩子的亲近感,如“啦”“呐”的使用。这些语气词是阿明在说起其他事件时不会使用的。这说明,男性面对亲子关系,更容易展现出“柔”的男性气质。

尽管如此,也有少数受访者提及不擅长情感表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孩子或者与孩子不“亲”。相反,他们会通过行动来表达对孩子无声的爱。来自山东的玲玲爸说道:“至于爱的表达方式,我不会用太多的言语表达,但是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表示)。”(20230505)比如,在外地出差时,他会购买当地的特产和小吃给女儿寄回家;在女儿生日时,他会提前购买生日蛋糕;等等。像玲玲爸这种“沉默的父爱”,可被视为一种无声的亲密,是中国式父爱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通过向孩子提供物质性支持或满足孩子的需要来体现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意,从而间接强化彼此的亲近感。因此,我们对父子情感实践的理解未必一定依赖传统的性别框架。否则,一些不善于口头表达的父亲容易被误解,因为有些父爱让人难以捉摸,孩子却可以感受得到。

与母职相似,现代父职也需要投入情感工作。现代育儿理念和儿童心理学强调孩子情绪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孩子已经明显展现出泽利泽(V. A. Zelizer)所说的“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特征。<sup>①</sup>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极其珍贵。为了给孩子提供有爱的成长环境,父亲们开始探索情感边界,注重情感管理,包括在与孩子的互动中隐藏愤怒、沮丧等负面情绪,或在必要时展现快乐、开心等积极情绪迎合孩子。例如,重庆的林俊表示,只要2岁的儿子有需求,即便感到很疲惫,不想陪孩子玩,他也会展现积极的情绪。“让自己处于一种很饱满、很开心的状态感染他。不让他看到我是一个很疲劳、很不想说话或者很愤怒的那种爸爸。”(20210312)通过打造快乐、开心的父亲形象,这些父亲努力创造一种充满爱与愉悦的家庭氛围。

### 从个体反思到制度重塑:情感规则转变的基础

上述发现预示着当代中国父职的情感规则发生了转变。它从一种强调父亲权威、身体缺席、保持情感距离、情感表达保守的模式迈向一种注重沟通与交流、具身亲密体验、情感表达积极的模式。这种转变既是当下宏观社会变革与微观个体情感体验相互交织的镜像,也是个体、家庭、社会与国家相互形塑的产物。尽管如此,本文并不认为父职情感规则是从一种情感规范彻底迈向另一种情感规范。不同时代可能并存多种情感规范,只是在特定的时代,某种情感规范会成为主流,主导男性的父职实践。例如,一些历史学者研究发现,在明清社会的士人阶层中,父亲和孩子之间也已出现亲昵互动的端倪。<sup>②</sup>然而,这些亲密互动只是独特地出现在士人

<sup>①</sup> 参见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sup>②</sup> 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

阶层的家庭,并非彼时主流的情感基调。

### (一)个体动力:父亲的情感反思

父职情感规则的转变是个体情感反思的结果。男性会根据童年的生活经历对父职进行反身性建构。本文的大多数受访者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家庭的核心与“唯一的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有以往研究描述的“小皇帝”经历。相反,如前所述,在他们的叙事中,“父亲缺席”的童年故事揭开了一代人情感体验的失落。比如,来自重庆的妍妍爸如此描述童年生活:“从小我就在一种比较缺爱的环境中长大。正是因为这种环境,我就会给自己一种要多给孩子爱的那种感觉,保护欲就会更强,有了女儿之后,更是如此。”(20210320)

妍妍爸的分享并非特殊的个案,而是一代人普遍的情感失落经历。受访者回忆起父亲时,“放养”“严父”“不称职”“很少见到他”“做得不到位”“大男子主义”“交流得不多”“典型的传统式父亲”等描述失落童年的话语是普遍提到的关键词。一些受访者甚至用“补偿式育儿”来表达对失落童年的不满。通过反思失落的童年经历,这些父亲摒弃了父辈那种沉默寡言、不善表达的育儿理念,希望与孩子建立一种更具表达性与情感性的亲子关系。

### (二)家庭基础:结构变化与情感回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与之前的大家庭相比,孩子数量的减少带来了儿童中心主义的盛行,孩子的情感价值逐渐增强,父亲也会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照顾和关爱孩子等方面,这种密切的家庭联系也使得父亲更容易与子女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系。访谈中,四川的小象爸表示:“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以后也不会要二胎了,不把爱给他,那给谁呢?”(20210328)

除了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外,21世纪初,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也经历了转变,这突出地体现在一种新型的家庭情感伦理正在形成。在传统社会的大家庭中,孝道观念主导着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孝顺和关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男性更多地将情感互动的焦点放在父母身上。如今,亲情逐渐取代孝道成为主导家庭生活的伦理准则,父母权力和权威的式微催生“倒立的家庭”(inverted family)模式,亲子一体的价值观及其所带来的亲子之间情感的亲密性成为亲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 父亲与孩子间日益频繁的情感互动不仅受家庭情感结构转变的影响,其互动实践本身又持续强化着亲情主导的家庭价值观。

另外,家庭情感功能的回归也推动了父职情感规则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内卷”的职场环境中,理想员工的要求往往将男性禁锢在工作场域,高强度的工作也使得父亲们感到身心俱疲。在此情境下,家庭成为男性获得情感满足的重要场所,家庭的情感功能也变得愈发重要。例如,来自贵州的小宇爸说道:“每次(下班)回来,听到他叫爸爸,都会特别激动、欣慰,特别开心。回来以后,不管他想玩什么,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尽量陪他玩。”(20210217)

### (三)外部动因:社会期待与国家力量

父职情感规则的转变是男性对情感文化变迁与国家家庭建设的回应。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的情感文化正在经历重新定位。这种全球情感文化的变迁也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sup>①</sup> Y. X. Yan, “The Private Life Approach to The Rise of Neo-Familism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3, No. 4 (2025), pp. 753-77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开始宣传和推广“好父亲”的形象,反对“父亲缺席”,并鼓励父亲更加亲密地融入孩子的生活。近年来,一系列亲子综艺节目积极塑造“温柔型”和“积极型”的父亲形象。抖音短视频、微博平台上的各类“爸爸用户”也在通过展示父子之间温暖、感人的情感互动来打造亲密父子关系。这些官方话语和媒体平台所宣传的父亲形象正在重塑父职的情感文化,不仅塑造了温情、擅长情感表达、积极参与育儿的男性形象,也为男性树立了做父亲的榜样。

此外,国家对家庭的关注有显著的增加和强化趋势,其介入特点已从过去单纯以宏观的干预和控制为主,转向微观的更具支持和服务色彩的多元面向。<sup>①</sup> 一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了夫妻家务劳动分配、育儿分工等,旨在营造“平均分担家务、父母共同参与、加强亲子交流、共同陪伴成长”的育儿氛围。为加快推动和谐家庭建设,2021 年 10 月更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此“家事”变为“国事”。其主张的父母要“亲自养育”“共同参与”“严慈相济”“平等交流”“相互促进”等新型亲职理念,不仅使得父母履行亲职有法可依,也为实践亲职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与父职相关的权益近年来逐渐被纳入国家优化生育支持体系的制度化进程中,例如父母育儿假的设立。尽管从实施层面来看,父亲实际申请育儿假的比例仍偏低,政策落实存在一定障碍,但在调查中发现,育儿假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为父亲提供了更多参与育儿的可能性,增强了其在亲职实践中的情感投入。特别是在父亲请假独自育儿的情境下,这一政策有助于推动父职的情感化转型,强化其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

## 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家庭中,“亲”成为联结父子的情感。与一些研究强调西方父亲对孩子的情感表达、情感互惠或情感工作相似,本文也指出中国父亲在亲子互动中不仅主张积极的情感表达,也通过情感工作的策略履行父职。此外,本文揭示了父职情感规则的其他面向。在具身性层面,中国父亲通过身体贴近(而非密集照料)弥补传统父职的缺席,体现“身体在场”的情感价值;在沟通性层面,与艾华(H. Evans)强调只存在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性别化沟通式亲密不一样,<sup>②</sup>本文指出,在当代城市家庭中,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并非性别化的,男性也渴望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期待建立平等、民主的父子关系。这些发现揭示了当代中国父职情感规则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新家庭主义”在代际关系中的具体表现,由具身性、沟通性与表达性构成的代际亲密成为当下中国亲子关系的核心特征。同时,这种代际亲密的生成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包括个体情感的反身性建构、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与家庭情感结构和情感功能的重塑、社会情感文化的转型,以及国家对家庭建设的高度重视等。

<sup>①</sup> 吴小英:《问题和语境:当下中国家庭研究热点及其范式争议》,《学海》2025 年第 1 期。

<sup>②</sup> H. Evans,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4(2010), pp. 980-1000.

以父职为切入点,本文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情感面向。当代中国城市父亲的男性气质朝着更具情感性、关怀性的方向迈进。传统的情感规则以经济支持、隐忍自持和理性克制为核心的男性气质为基底,温柔、细腻、关爱与情感表达等特质则通常被视为“女性化”属性。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不仅忽视了男性情感需求的合理性,也对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受访父亲正在主动模糊和拓展儿童照护中的性别边界与情感界限,通过具身互动、沟通交流、言说的亲密等实践建构起一种亲密父职。但是,与西方“新父职”强调情感互惠与平等的亲子关系不同,中国父职仍保留儒家严慈相济的混合特质,如权威与沟通并存。这种差异可归因于儒家文化对“敬”的延续与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情感诉求的张力。此外,中国亲密父职意味着性别与情感不应被视为二元对立的范畴,相反,二者的交织和融合不仅能够在家中实现更为丰富的情感传递,也能带来更为饱满的亲密体验,从而为孩子的社会化发展营造一个更具性别平等和情感支持特征的成长环境。

考虑到上述新型父职情感规则有助于提升男性育儿幸福感,从而增强家庭生育意愿,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重视男性在儿童照护中的情感投入。一方面,可将父职情感规则纳入优化生育支持体系的逻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需要物质支持,如经济补贴,更需通过情感文化建设缓解育儿焦虑。例如,鼓励男性更多参与子女学龄前阶段的养育可以缓解密集母职带来的压力,增强女性的生育信心,形成正向循环。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公益广告等公共宣传塑造亲密父职形象,改变“沉默式父爱”的文化认知,从而更有益于孩子的情感社会化发展。

作为中国父职情感规则的一项初步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一些局限。受访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他们在叙述和反思父职的情感实践时有着较为丰富的能力。另外,本文更多呈现的是父亲与少数母亲的看法和感受,忽略了作为情感规则接受者孩子的想法。尽管如此,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国城市家庭父亲情感参与的新图景。面向未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任重道远,需要个体、家庭、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合力、共同推进。

作者简介:王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黄永亮〕